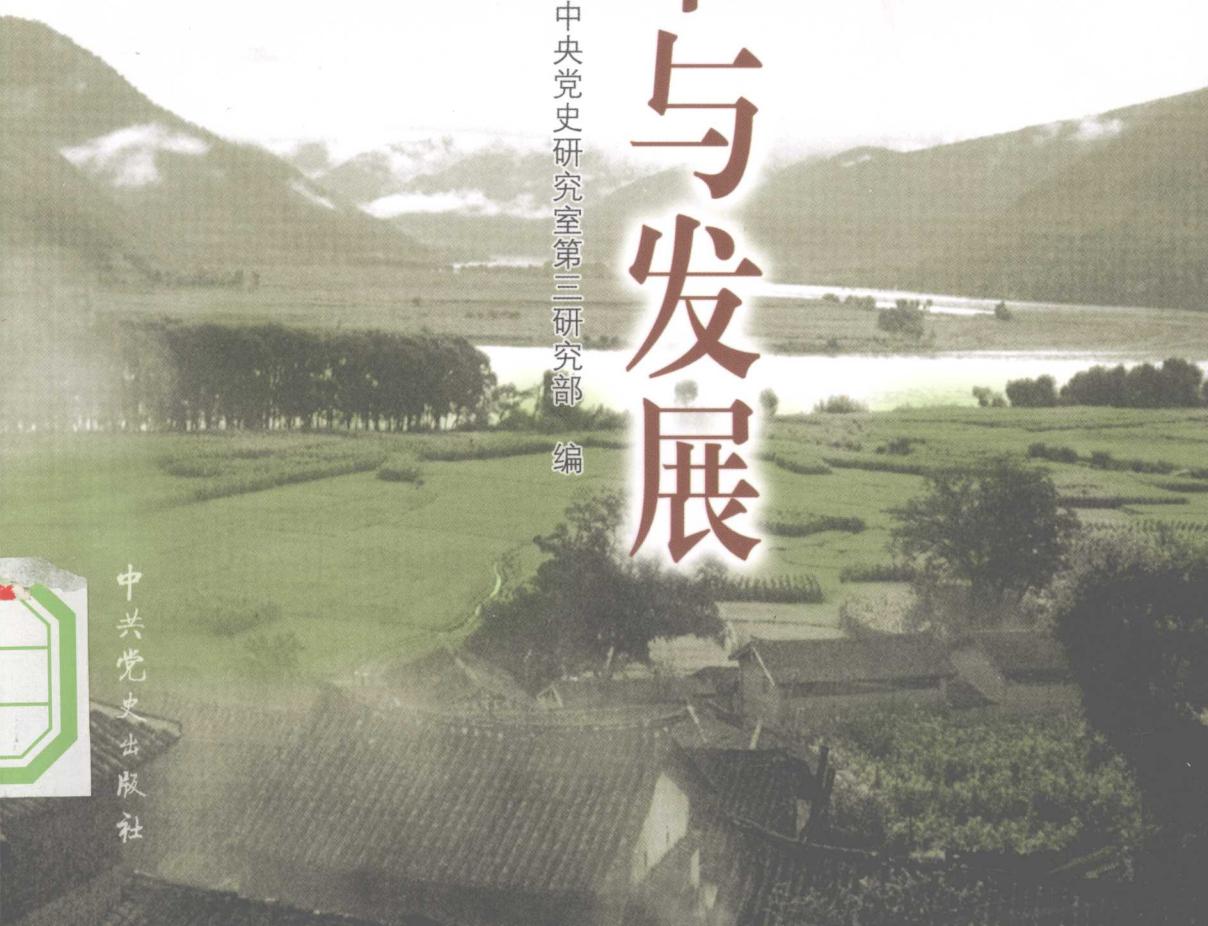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系列专题研究之三

民族地区的

农村改革与发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系列专题研究之三

民族地区的

农村改革与发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三研究部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199-968-9

I. 民… II. 民… III. ①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经济
体制改革—中国—1978—1992 ②民族地区—农村经济
—经济发展—中国—1978—1992 IV. F32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822 号

书 名：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

编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责任编辑: 高秀清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 dscbs.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162mm×235mm 1/16

字 数: 327 千字

印 张: 23. 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968-9

定 价: 36.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前　　言

以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辉煌壮丽。研究好这段历史，对于以史资政和以史育人，别有意义。

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历史，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应引起足够的关注。我国是一个有着 56 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除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等五个自治区外，还有云南、青海、贵州等三个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高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 33.4%、34.7%、42.1%），再加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30 个民族自治州、124 个民族自治县、1700 多个民族自治乡。民族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64% 以上。即使是各民族地区彼此之间的情况差异也很大。如果不把民族地区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好，就很难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我国整个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再加上，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发展在我国整个改革与发展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着突出的特点。因此，研究好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整个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民族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全国农村改革基本是同步的。就全国的形势而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拨乱反正，系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全党的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得到极大解放。在党的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

下，农村改革勃然兴起，并迅猛地推行于全国。民族地区在全国这一大背景之下，农村改革也分阶段地逐步得以推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个阶段实现了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和城市改革的起步。在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城市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第二阶段，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这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这一阶段，民族地区在农村改革中进行了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

通过上述两步改革，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充分改善。我们党和我国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一起，用浓墨重彩绘就的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变革的伟大历史画卷，其中饱含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和发展，并有力地推动着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深刻蕴意，同时也饱含了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其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生动情景。在这部分历史中充满着互动与创造。这种互动既体现了中央的有力指导，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

可以说，新时期民族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富有内涵和经验。研究民族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对于人们深化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增加对中国农村的全面了解、提高政策水平；对于社会各个方面乃至整个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民族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然，由于新时期民族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历史的沉淀还不充分，资料的发掘和掌握还有诸多局限，我们虽然已

把新时期民族地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作为新时期党史研究的系列专题之一，在“1978年至1992年民族地区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展开研讨，并且今后还将举办多次类似的研讨会，按照计划不断推进这一研究。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目前还不能讳言其差距，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存在着许多不足，本书也肯定还有不少欠妥和疏漏之处。因此，我们恳请各位读者对于本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以求在不断切磋和探讨中将这一研究继续引向深入。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吉林省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特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 者

2008年3月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978—1992 年新疆改革开放综述	陈国裕 熊坤静 / 1
1978—1992 年四川民族地区改革 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卢耸岗 郭生春 罗凉昭 / 35
1978—199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改革与发展	李 艺 / 56
1978—1993 年西藏改革与经济发展 ——兼论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杨付静 / 93
1978—1992 年内蒙古改革与发展综述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的 “模范自治州”建设	袁俊芳 / 121 黄荣权 高 峰 张 鸿 / 152
“塞上江南”展新姿 改革开放结硕果 ——改革开放前期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张远成 / 162
1978—1992 年四川阿坝州改革开放的 回顾与思考	李仲康 李瑞琼 / 189
广西扶贫开发的历史考察	阙伟光 / 211
新疆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	王春雅 / 236
新疆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	祁若雄 / 254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拨乱反正	杨林兴 / 268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张晖 / 287

1978—1992年吉林省民族地区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

邹艳 / 307

1978—1992年吉林省少数民族地区改革

与发展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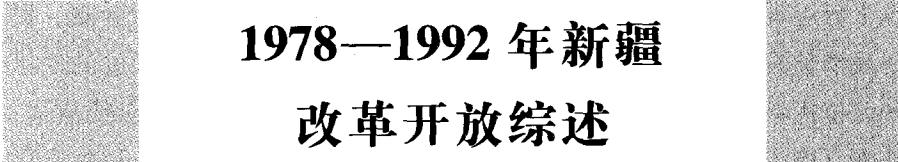
崔文 / 321

从省情出发，探索云南民族地区改革发展道路

何燕 / 335

1978—1992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发展

王姣姣 / 357



1978—1992 年新疆 改革开放综述

陈国裕 熊坤静

幅员辽阔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达 166 万平方公里，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周边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 5600 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新疆现有 47 个民族，主要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满、达斡尔等 13 个世居民族。^① 由于民族众多，其宗教信仰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以伊斯兰教信仰者为多。2005 年全区总人口 2010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60%。全疆下辖 14 个地州市，99 个县（市、区）。^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人口 256 万，14 个师、174 个农牧团场，分布在全疆各地。^③

作为一个远离海洋、山多沙漠多且气候干燥少雨的内陆省区，新疆的资源很丰富，主要表现在：一是水土光热资源充足。现有耕地 6000 万亩，另有宜垦荒地 1 亿亩。^④ 共有大小河流 570 条，地表水年径

① 陈虹主编：《新疆统计年鉴 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2—83 页。

② 《新疆统计年鉴 2006》，第 77—78 页。

③ 《新疆统计年鉴 2006》，第 93—96 页。

④ 《新疆统计年鉴 2006》，第 5 页。

流量 884 亿立方米，地下水平均补给量 395 亿立方米，可采量 252 亿立方米。^① 二是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大。目前已发现 138 种，其中储量居全国前 10 位的达 43 种，有 5 种居全国首位，石油、天然气、煤炭的预测资源量分别为 209.2 亿吨、10.3 万亿立方米、2.19 万亿吨，均占全国预测储量的 30% 以上。^② 另外，铜、铁、镍、钾盐、黄金等资源也十分可观。三是旅游资源丰富。新疆境内名胜古迹、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独具特色，旅游开发前景广阔。四是新疆具有向西开放的地缘和区位优势，现有 17 个国家一类口岸。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全线贯通，新疆已成为我国开拓中亚、南亚和东欧市场的前沿阵地。五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解放前，新疆地处边远，交通闭塞，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自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以来，新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带领全疆各族人民全面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改变了新疆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迟缓的面貌，使新疆从无到有，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初具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新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天经济基础不足，却同全国一样，按照苏联模式同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对于集中资源，保证重点建设，改变地区经济布局，建立新疆工业化的基础，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过于集中的体制以及相应过于庞大的上层管理机构，同新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运行机制；统收统支，大包大揽，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严重压抑了基层生产单位和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延缓了经济发展的势头和进程。

① 《新疆统计年鉴 2006》，第 248 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12 页。

一、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破冰

十年浩劫中，新疆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经济建设，濒临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神州大地春意萌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带领全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努力。

（一）深入开展揭批查工作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6年11月8日，自治区党委发出《揭批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广泛发动群众，联系新疆实际，采取多种形式，深入揭发和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及其破坏新疆各项工作的罪行，并成立了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各地开展揭批查工作。随后，一个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高潮在全疆范围内迅速掀起。

为了将揭批查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党中央改组了新疆的党政领导班子，自治区党委也于1978年11月5日发出《关于继续深入揭发林彪、“四人帮”，立即开展“一批双打”斗争的指示》，此后，“一批双打”（即揭批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斗争在全疆县以上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农垦团场全面展开，在克服“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混乱状态，整顿恢复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阐明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一石击起千重浪，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新疆是较早作出回应的省区之一。自 1978 年 5 月以后，《新疆日报》陆续转载、刊登了全国各大报刊所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自治区党委在 8 月 11 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联系新疆实际，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接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配合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讨论真理问题的需要，在全国率先印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问题的唯一标准》一书。其中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该书所写的《编者的话》，被《人民日报》9 月 27 日版转载。8 月 23 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由各大专院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驻疆部队和乌鲁木齐有关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干部参加的加强理论学习会议，传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的精神，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广泛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发扬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风，通过讨论准确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随后，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党委工作会议上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话被新华社报道。10 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又召开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会议，对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此后，自治区直属机关和乌鲁木齐地区的一些单位，先后多次召开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理论讨论会，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疆各地、州、市、县和基层单位，也根据各级党委的安排，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各地主要负责同志在讨论会上带头发言，紧密联系实际，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干部纷纷在各地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学习体会。

为了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自治区党委于 1979 年 6 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对各地进一步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具体要求。10 月，自治区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

深入讨论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论认识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坚持实践标准对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意义的认识。从而为自治区更好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1977 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通过领导全疆各族干部群众积极开展揭批查，初步划清了大是大非，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起用了一批长期受迫害的老干部进入党政各级领导班子。1978 年 3 月 11 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清理干部积案，妥善处理审查干部中的遗留问题，尽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紧接着，自治区党委于 4 月 5 日发出〔1978〕36 号文件，对全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作了部署；在 4 月 15 日发出《关于做好文化大革命中死亡同志的善后工作的通知》，要求给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同志作出正确结论，恢复名誉，开追悼会，予以昭雪。

4 月 28 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8）11 号文件的意见》，对于在 1958 年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戴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的人的摘帽工作专门作了安排。至 1982 年 4 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时，对右派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摘帽和错划人员的复查改正、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这一会议精神，于 1979 年 1 月 5 日至 26 日召开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对自治区“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报经党中央批准后，自治区党委即抓紧了对“文化大革命”和“四清”、“反右倾”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旧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自治区党委于 1978 年 5 月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认真讨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并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

政策领导小组。随后，自治区党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召开汇报会议，研究落实的措施。会议要求排除阻力，迅速形成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局面，并要求各单位在近期做好技术职称的恢复工作，提升一批科技人员和教学人员，为科技人员办几件具体实事。6月21日至7月2日，自治区召开科学大会，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提高对科学技术现代化重要性的认识，将科学技术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一把手要亲自抓，并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科学技术规划，表彰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9月，自治区党委陆续批转了自治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关于用非所学的专业人员的调整范围的意见》、《关于当前集中解决一批知识分子夫妻分居问题的意见》、《关于自治区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意见》等文件，转发全疆执行，效果良好。在此基础上，自治区党委于1979年7月20日至28日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新长征中的重要作用，自觉、切实地做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这次会议对于推动全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落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浩劫导致新疆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党委于1979年9月7日发出《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的指示》，强调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新时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提出对各族群众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要求，继之又发出《关于抓紧解决宗教活动场所的通知》。1980年6月30日，自治区党委颁布了《加强民族团结守则》和《执行宗教政策守则》，并于随后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成为新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指导原则。在1982年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首届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倡议书，从1983年起，将每年5月确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此后，这项群众性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便在新疆各族人民中间广泛、深入而又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改善民族关系，加强

民族团结，为顺利实现全疆工作重点的转移，全面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

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新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对于不符合新疆区情，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积极慎重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在 1978 年至 1992 年的 14 年间，新疆的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生产领域发展到流通、分配领域，从微观搞活企业发展到宏观改善管理，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新疆经济体制改革的奠基和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以转移工作重点、调整国民经济奠定基础，以农村牧区改革为重点，并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中获得突破。

1. 转移工作重点，调整国民经济

在 1979 年 1 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迅速传达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文件，研究了加快自治区农牧业发展的措施，决定把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紧接着，自治区革委会于 3 月 6 日至 10 日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了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精神，研究了自治区各级革委会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和当前应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4 月 1 日，《新疆日报》发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社论。在此前后，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以及自治区团委、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经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宣传部等部门，也曾分别召开有关会议讨论并研究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牧区经济，自治区党委十分重视落实农村牧区的经济政策。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5月23日，自治区党委即召开电话会议，宣布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当前自治区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明确了实行定额管理，搞好评工记分；鼓励增产，实行超产奖励；反对“一平二调”，减轻生产队负担；办好社队企业；允许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拥有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果园和宅基地等问题。^①这个《决定》着重纠正正在计算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从而使包工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得到恢复，同时也首次强调了发展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的问题。

10月9日，自治区党委制定《关于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又称“牧业十二条”。它对正确贯彻执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反对一平二调，减轻牧民负担；鼓励增产，多劳多得；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和奖励政策；严禁乱宰牲畜，保护和建设牧草场；允许饲养自留畜等问题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因而受到牧区干部群众的欢迎。^②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于1979年5月24日联合发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试行草案）》，对1978年制定的“农村八条”和“牧业十二条”作了补充。这个规定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五定一奖一赔”（即定面积、定产量、定征购任务、定费用、定工分、超产奖减产赔）生产责任制。^③从此，这一生产责任制得到普遍推广。

经国务院批准，自治区革委会于1979年9月改为自治区人民政

^① 富文主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第106—107页。

^③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第120页。

府，同时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随后，自治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得到充实，各地、州、县、市人民政府也相继恢复，逐步实行党政分开，加强了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1983年4月19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农委《关于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报告》。至1985年，自治区共建立乡（镇）人民政府824个，村民委员会8093个。^①由此从体制上加强了政府的工作，为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组织保障。

与此同时，新疆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也全面展开。1979年5月3日至1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分析了新疆的国民经济形势，认为1978年全疆工农牧业生产虽有较大的恢复，但经济比例关系，尤其是农、轻、重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畜、副产品的产量依然很低，人均占有粮食、油料和牲畜头数，均低于1966年，既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也不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会议强调继续集中力量搞好农牧业生产，围绕农牧业办工业的方针，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农业投资比重由1978年的15.6%提高到1979年的17.4%，1980年又提高到18.5%；轻工业的投资比重由2.1%提高到2.8%，1980年又提高到3.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则由48.2%调低到43.9%，1980年又调低到42.9%。在农业内部，强调提高单产，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力争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油、肉、糖实现自给。^②

2. 农区经济体制改革

在新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生事物则首先是在南疆兴起的，显示了当地农民的巨大创造力。1979年春，新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阿其克公社党委书记吾库尔·外力经过对当地农民虽有大量的耕地，却连口粮都要靠国家调运来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只有彻底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才能够发展生产力，

^① 党育林、张玉玺主编：《当代新疆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第118—119页。